

见贤思齐 培植信心 养育僧才

——从虚云和尚说到现代佛教僧源及教育

◎寂慧

近代影响佛教发展的大德有很多,但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虚云和尚与太虚大师。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为佛教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虚云和尚则从信、解、行、证的角度,为后之来者留下了宝贵而根本的实践财富,是佛教核心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佛教不论发展到何种程度,若无此精神,也就成为明堂中的木柁、金字塔中的圣物。

虚老的成就离不开早年信心养成与善友激励,虚云和尚早年得益于明师,中年与善友唱和,由是积累了后来普照人天的福德资粮。鼓山妙莲和尚道德学问超出常伦,虚公受其戒,种下正因种子,再后又承其法。三年木食涧饮的深山修道生活后,得到了天台镜融长老的教导,才不致偏于狂放,行于佛法正道。之后参讲于各讲经法会,相玩于各大善知识之间,渐渐深入法藏,确立正知正见。在正见的指导下,北上五台朝圣,南下高旻参禅;在解、行、愿力的推动下,终于彻见诸佛底源,明了祖师不欺人之意。高旻寺参禅开悟后结茅终南及行走江湖,期间为伍者皆大率是月霞、冶开这样的法师善友。这些都是养成虚云和尚法身慧命不可或缺的因缘之一,也由是才有后来大转法轮、普利人天,迥出常伦不可思议之举。给二十世纪中期中国佛教带来一片耀古腾今的灿烂光芒。“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是千古真理。就像极其衰微的明末佛教一样,有四大师的横空出世,呈现出兴盛之势。再往前的盛唐时,因为有各宗派大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所以有佛教的大繁荣与大发展。

二十世纪早期,社会动荡不安,佛教亦是延续着清末以来贫弱残喘的景象,却能造就如是大师。如今



国家强盛,人民安乐,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呈现出一片祥和之光,在此际遇下,佛教更应抖擞精神,乘时俱进,养育更多的僧才、大师。这是佛教在这个时代的呼唤,也是这个时代对佛教的要求。也就有了“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的深切期待。

大师不是空中楼阁,是从坚实的基础开始的。那么基础是什么呢?是培育信心。只有在信心的庄严贯穿之下,才能悠游于佛法的大海,进而庄严他人、庄严社会。如果缺失了信心,那么佛法也就成了佛学,成了一门学术、学问、知识、技能。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就是学者、专家,而不是僧才、大师。大师不是从地涌出,如法华会中的菩萨一样,而是从众多的法师、僧人中,在信心的确立、善知识的磨砺中脱颖而出。信心的培养从深入法藏开始;而善知识的磨砺则是良师益友间相

互的激励与教化。

仅仅如此是不是就够了呢?当然不是,这是就眉睫处说。广而言之,需要佛教自身的环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就是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大会上提到的五个建设。这五个建设是就全体僧团而言。在此基础上,更要加强初入僧团(僧源)和青年僧的教育(育僧)这两个方面建设,他们是佛教的未来。

一、现代佛教的僧源问题

当前佛教经过三十年宗教政策的稳步推进,佛教的教职人员——僧人,在整个人口比例中依然有限得很。《文汇报》2009年2月17日登载了一篇学诚法师的采访。其中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地批准开放的寺院有1万多所,但与此同时,全国平均每所寺院拥有不到5名僧人,大部分寺院僧才缺乏。目前大陆汉族地区的出家人数才4万多,而处于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唐朝,出家人将近30万。这一差距在古今人口基数的巨大变化中显得更为突出。”虽然在老一辈大德高僧的呵护培养下,已有不少青年僧才崭露头角,脱颖而出。但在整个佛教大盘上,仍是十分的单薄和有限。

而僧源亦是问题。现代社会独生子女增加,来源于社会又融入于社会的僧源势必受到影响。在有限的僧源中,具足信心而又得到良好的佛法教育的就更不是多数了。这在选择出家生活的几种情况中可以略见一斑。一类是为求衣食而来;二类是因为磨难的人生来求佛庇护;三类是被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知识摄受,而自愿选择;四类是因为发自内心的信仰而来出家求证佛法。在这四类中,后胜于前。前。“信”贯之于前后,只是具备纯正的信仰如凤栖于梧桐。

在这些的僧源中,能够遇到好道场、好法师的加护,同道善友的提携,前前也就不差于后后。若非如此,最起码的善知识都没有因缘遇到,而是病急乱投医,好心出家,到头来辜负了初心,后后也就不强于前前了。

再者,庙多僧少也给僧源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某些戒场中,往往能看到才刚出家不久的三五个、七八个

60岁以上的老人在受戒,常住出于对老人的照顾,也就不要他们随众,别住一处,到戒期结束拿了戒牒走人了事。其原因就是某些常住实在是需要人,对于来求度的人也就方便为之。自1996年,中国佛教协会在福建莆田广化寺举办规范传戒以后,每次传戒人数就基本控制在三百人左右。近六年间,全国汉传佛教每年平均受戒人数在五千人左右,这样的僧源远远不能满足各地现有寺院的需求。寺多僧少,供需失衡,自然而然地对于僧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连带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目前内地汉传佛教经批准的约有34所高、中级佛学院,在这么多的学院中,闽南佛学院人数相对较多。其自1985年复办“至2007年6月间毕业十届本科生,共计毕业男女学僧752名。”在院预科男、女众学僧100人,本科男、女众学僧202人。这里是包括男女二众两个学院的,而其它学院大多只是男众或女众。就目前中国佛学院来说,有两个班,2009年招生46名,现在两班总人数也才90人,每两年毕业一届,那么也就是说每两年培养45位左右学僧。就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来说,情况也差不多,每两年毕业一届,每届一般也就在40人左右。在34所中高级佛学院中,以上所列三家是佛学院中有代表性的,仔细算来,毕业的学僧也不是很多。

本来僧源的不足就已经对佛教院校教育规模和质量产生了一定影响,进而在毕业学僧中,有一部分积极投身于院务和寺务之中——他们正是各寺院求之不得的人才;有部分全身心地悠游法海、专门从事弘法研究;还有一小部分很快就被社会淹没。淹没的原因也正是信仰之信心没有培植起来。而信心的培植,正是佛教而今而后之关键。

二、当前育僧问题

新时代对佛教也有新要求。僧人应该具备爱国爱教、深入佛法等基本品质。其中信仰纯正亦是基本品质之一。作为僧人,信仰是其根本,如果僧人信仰

缺位了,夫复何言!信仰需要不断栽培养育,这也是培养僧才的初步;在此基础上进而培养专才,从中孕育大师。

当前僧教育,很多法师、学者都曾论及,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培养的是宗教家,其行为足以为人天楷模。假如品行太差,就连社会一般人的素养都比不上,何以化导社会呢?所以佛教界的当务之急,是要倡导素质教育。未来的佛教教育应该以提升人的素质为重点。”(济群法师《我理想的佛教教育》)他认为僧教育要从基本素质来抓起。那么僧人素质当然包括至关重要的基本信仰。

在僧人信仰养成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环节:一是剃度师父启蒙,二是戒堂师父规范,三是依止师父教化,四是学院法师教导。这里第一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不是决定因素,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僧人未来的修学方向。如大德身行言教,对与弟子或学人影响至深至远。如太虚大师、虚云和尚,其门风不同,学僧、弟子的风格虽有差别,但他们的学僧或弟子皆是现代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此即是大德教化之功。又如现在的一诚长老,承继了临济和沩仰两宗法脉,而其教育弟子,引导学人的风格多是沩仰“父慈子孝,上令下从,尔欲捧饭,我便与羹;尔欲渡江,我便撑船”(《人天眼目》)人事相应,物我交融的风格,对弟子言传身教影响至深。亦如已故的佛源长老,以云门截流之机,教引弟子,坐下良将高材不乏其人。这样是大德身传言教对学僧信心和行为影响之重要。

戒堂虽然时间较短,但因为是一个僧人之为僧的重要阶段,堂中规矩、三师七证对僧人信仰的信心培养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依止师父是指依于某位师父学习而言,优秀的依止师父可遇而不可求,依其学习对学僧的信心养成也很重要。

至于佛学院教育,圣凯法师是从佛学院走向社会大学的,对于佛学院教育有自己深刻的认识、独到的见解。他在《当前发展佛教教育的“盲点”》一文中,对佛学院深为忧虑。“佛教学院也和社会大学一样,成为

纯粹传授知识的场所。许多青年僧人通过佛学院的几年学习,往往信仰淡化,道心退堕,甚至返俗,回到社会。”这是济群法师在《我理想的佛教教育》一文中的一句话。济群法师在闽南佛学院任教多年,并创办西园戒幢佛学研究所亦有十多年历史,对于佛教教育的认识深度可想而知。所以学院教育也要以信仰建设为基点(批注:为什么学院里有一些学僧在几年的学习以后,出现信仰淡化的倾向呢?这与学院教育是有深刻的内在关系的。现在的学院教育大多偏向于理论学习,而在以信仰为载体的佛教,在信仰建设这一部分明显不足。因此,在学院教育中,要加强信仰建设,以信仰建设为基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虚老在云居山上曾办过一个“佛学班”,其学习方法之一是背诵经典。如今云居山真如禅寺也办了一个“禅学院”,我们尊敬的一诚长老非常关心,每谈及此事都很认真严肃地强调:“佛学院学僧要背经文”。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观念,恰恰是现在学僧信心建设的起点。

请法师以大座的形式讲经说法也是虚老办学院的方法之一,当时请的就是近代大名鼎鼎的海灯法师。一诚长老在重建江西佛学院的时候也延请法师升座讲经说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僧学风道风相对朴实和扎实。

这两个方法,现代教育视之为落后落伍,跟不上形势,恰恰是一个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就像现代社会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一样。我们要的是培养僧才,针对初学者就培养信心而言,读诵经典能更好地深入经藏,体究佛法;而讲经说法的方式,能更好地让学僧生起信心。

在信心培育的基础上,其次是培养专才。一类专才是专宗;二是专科。专宗是就某个宗派而言,深入研究,出专宗人才。专科是就目前佛教界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如管理人才、教育人才、研究人才、弘法人才等。专才的培养基本是在各专科学院,或者各学院专科;教内学院,或者社会学院中完成。“应当培养佛

教急需的专业人才、社会急需的职业人才。就佛教自身的发展而言,出家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具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面的知识:管理、财务、人事、文秘、公关、图书与档案管理、园林、文物、佛教艺术、寺院规划、设计、建设等。就社会需要而言,出家人必须具备心灵辅导、减压、调解各种问题等的专业知识。这些内容应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佛教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净因法师《汉地佛学院课程设置调研报告》)但当前各级佛学院大同小异,课程差不多,自身特色不明确,要培养专才真是不容易。有了专才,才有孕育大师的可能。

如果说,大师如虚云和尚,给人以偏向传统守旧的意蕴;那么太虚大师亦是大师,可谓前卫了吧?太虚大师早年如果没有大德如八指头陀及其师公的教导,如果没有普陀山近三年的闭关过程养成对佛法的信心,很难说在他40岁的时候没有出人意料的变化,尽管这样40岁时他还有变化身份的念头(见印顺长老《太虚大师年谱》)。由此亦可见善知识及深入法藏以养成信心的重要之一斑。弘扬佛法需要法师,振兴佛教则需要大师。不论是师徒传授,还是寺院教化、学院教育;不管是养成法师,还是造就大师,都要从信仰和信心开始。“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四川甘孜召开第三期藏传佛教寺院民主管理研讨会

本刊讯 6月13日上午,四川省甘孜州佛教协会第三期藏传佛教寺院民主管理研讨会在康定召开。会议回顾总结了州佛协自创立以来的主要工作,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州委统战部长益西达瓦就全州藏传佛教寺院民主管理作了讲话。

副州长降初,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德明,州政协副主席、四川民族学院教授噶玛降村,省佛教协会秘书长王立军出席会议。

益西达瓦在讲话中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只要还有人信仰宗教,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是权宜之计。尊重和保护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党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人权的重要体现,也是最大限度团结人民群众的需要。当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我州得到了全面贯彻和落实,没有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没有我州藏传佛教的今天。但是,广大宗教界人士不能简单地把宗教信仰自由等同于宗教自由,不等于宗教活动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宗教活动超越法律允许范围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益西达瓦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在藏区和藏传佛教领域开展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遵纪守法是广大宗教界人士必须遵循的“三条底线”。益西达瓦指出,依法加强管理是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负责、未来负责。

会议期间,参会人员就如何完善和落实寺院民主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僧尼的行为,今后如何提升治教、弘法的能力和水平;如何进一步规划活佛转世规程;如何继承和发展藏传佛教所载有的民族文化;如何做好教法传承等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

州政协副主席、州佛教协会会长甲登·洛绒向巴作工作报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那仓·向巴昂翁作了讲话。州佛教协会副会长戈教·云登嘉措主持会议。

州委副秘书长龙明阿真,州政府副秘书长李德,州佛教协会副会长格达·扎西绒布、洛呷·泽旺晋美,州佛协秘书长仁孜,以及州内五大教派诸山长老参加了会议。会议特邀香根·巴登多吉仁波切、哈巴·降央洛珠仁波切、仁嘎·土登尼玛仁波切列席会议。

(宋志勇 卢雪英 德青翁姆)